

中共北京历史丛书

ZHONG
LISHI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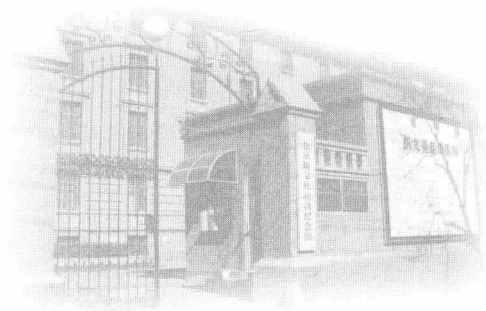
澄史追绪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学术论文集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澄史追绪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学术论文集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澄史追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学术论文集 / 中共北京市委
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

ISBN 978 - 7 - 5073 - 4621 - 3

I. ①澄…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共产党 - 党史 - 学术会议 - 文集
IV. ①D2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0463 号

澄史追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学术论文集

编 者：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颜晓晴 孙 翊

封面设计：欧阳显根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网 址：www. zywxpress. com

排 版：联文（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晨旭印刷厂

787 × 1092mm 16 开 13.75 印张 269 千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73 - 4621 - 3 定价：30.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中共北京历史丛书》编委会

主 任：李 良

副 主 任：陈志楣 范登生 刘 岳

委 员：赖生亮 常 颖 苏 峰 韩勤英
黄迎风 宋传信 李自华 徐香花

编 辑 部

主 任：黄迎风

成 员：黄迎风 高俊良 熊根琪 曹 楠
李自华 段丽欣 王桂环 祁 霄

执行编辑：段丽欣

编辑说明

近代以来的北京，历史地位独特，党史资源密集。党的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许多重要人物在这里工作、生活。这些事件和人物都是影响当代北京乃至全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因子，也是北京市党史部门开展研究和宣传的重要对象。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长期致力于这方面工作，特别是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召开和中央 10 号文件印发后，抓住机遇、乘势而为，取得丰硕成果。从 2011 年至 2016 年，仅发表文章就有 700 余篇，内容涉及早期党组织的创建、抗日战争史、隐蔽战线的斗争、工业建设、城市建设、党的自身建设、学术综述等方面。由于这些文章往往散见于各类报刊，不便于广大党史工作者、研究者及关心、热爱党史的人们学习和利用，因此，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中共北京历史丛书》，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本丛书选编范围及方法是，将 2011 年以来中共北京市党委史研究室组织编写或全体干部公开发表的党史文章，及《北京党史》期刊刊出的部分文章，按其反映主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或主要历史人物出现的早晚为序，分门别类编辑成册。

选编文章的史实与观点由作者严格把关。对明显失实或错误之处，编辑人员进行必要的修改或删减。文中不妥或错漏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7 年 8 月

目 录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探幽	侯且岸 (1)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形态的演变	张秋实 (23)
略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对中共建党的重要贡献 ...	肖 蛙 (38)
评析中共一大、二大政纲的重要发展	田子渝 (53)
关于红军长征里程问题的考辨	刘 波 (7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资产管理制度	何敬中 左玉河 (81)
突破“贫困陷阱”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	武 力 (103)
对高级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反思	罗平汉 (120)
体制悖论：大公社研究的新视角	辛 逸 (145)
对人民公社的评价不能偏废 ——从“废除人民公社”说起.....	郑有贵 (164)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发展	王春玺 (180)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决策体制变迁分析	沈传亮 (193)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探幽

侯且岸

【摘要】 本文遵循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对李大钊在五卅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理性的反思，深入分析了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特殊理路、理论内涵、西学背景、思想特征，同时明确指出了李大钊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缺失。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本文着力论证了李大钊当年未参与社会主义“论战”的缘故，深刻揭示了“问题与主义”讨论之后所呈现的思想升华，特别是认识论命题的展现。本文认为，李大钊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的先驱。

【关键词】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反思

关于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一直是李大钊研究中引人关注的问题。早在 25 年前，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与北京大学联合在北京隆重召开了“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学术讨论会，成为李大钊研究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对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如今 25 年过去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有些问题确实还有待于进一步解析。结合在研究中存在的疑惑，尤其是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本文试对这一思想再做深层的探析。

一、关于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理路

在五四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感召下，李大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然而，他的认知理路却是和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不同的。一方面，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他从与胡适的讨论中得到启示（下文将做专门分析），更重视从学理意义上对社会主义做深入的理论探究。

笔者在研究中还注意到：1920年下半年，李大钊并没有参与因罗素来华所引起的“上海共产党”方面和张东荪、梁启超等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论战”，他只是通过一篇短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以及对罗素的观点被曲解感到不满^①，而后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深入的理论研究之中。

今天看来，他的取舍是正确的、理性的。事实上，当时所谓的“论战”实质上是“语录战”“情感战”，于实际的理论研究不仅无补，反而有害。“论战”的双方各守己见，在论争中游离了主题，争论的焦点并不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凸显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手段上革命与改良的根本对立。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李大钊认为，尽管“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②，但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必须要进行“学理”上的探究。就在罗素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的当月底（1921年1月），他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他在文

^① 《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354页。

^②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

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绝非易事，所以必须要做认真的研究。“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因此，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相继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前者在启事中申明，这是一个研究马克思学说，“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后者的宗旨则说得很明白：“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①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有唯物史观、《资本论》、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等研究组。同时，还建立了各种语言的翻译组。罗章龙曾担任德文翻译组组长。据他回忆，蔡元培校长“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对德文组非常关心”。^② 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但“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资本论》是巨著。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不够，但很想翻译，开始是直译，参加这个工作的有一位北大教授和德文组的同学”。^③ 从罗章龙的回忆，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早期的翻译活动，而且他们对马克思著作的翻译是从德文原版开始的。他们将《资本论》视为理解社会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线索。

社会主义研究会决定编译《社会主义丛书》，分甲种和乙种，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发表社会主义论文。据李大钊的介绍，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后，即“邀请罗素博士作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在现阶段应着力介绍优秀书籍，组织编辑研究丛书，作为它的第一编已出版《基尔特社会主义》一书”。“目前正在翻译

① 《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65、486 页。

② 《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84 页。

③ 《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85 页。

中，今后将陆续出版的书籍还有数种”。^①可见，李大钊主张的理论翻译是充满包容性的，他并不十分介意被时人视为对立的社会主义观，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宗教社会主义等。恰恰相反，他要通过翻译不断丰富学理，并努力把这些有争议的理论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

二、关于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富有其特殊的理路和理论内涵，这一内涵的形成正是他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讨论的结果。他们之间的讨论是有益的交流，其实是共识大于分歧，完全没有像后人演绎的那般根本对立。如今，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党史学界已经基本接受了笔者在10年前的观点。^②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关于“问题与主义”讨论中的“主义”究竟是何物。事实上，它所涉及的主义是当时人们格外关切的现实的反映——社会主义在中国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完全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要知道，在讨论中，李大钊将问题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来认知，正确地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大哲学命题，从而开启中国共产党理论史之先河。也就是说，透过“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表象，我们捕捉到李大钊思想的真正超越，并从中真切地感受到理性的生成。因此，笔者认为，考察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需要建构理性的思维，使用“理在事中”“实事求是”

^① 《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②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6期。

的方法，才能获取真谛。我们绝不能孤立地罗列他的文章的观点（事实上，我们以往的研究就是这样做的，习惯于用教条化的标准，将李大钊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学说简单对号入座，如果没有达到想象中的“一致”，就被归于“不成熟”，这已成为研究者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而是要联系他在同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分析他在同一时期的相关文章，围绕具体问题，梳理思想脉络，展示思想变化。这里，笔者想就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一关键性的认识论命题进行初步的个案分析，还原当时的历史，从动态中揭示李大钊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观”的内在价值。

大家知道，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①一文在《新青年》刊出前的最后定稿，李大钊在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后，利用暑期，到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间，他也同时为《每周评论》撰稿，涉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为他所主持的《少年中国》撰稿，即《“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发表于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在与自然的接触中，五峰山胜境为他营造了良好的心境，他还撰写了游记和诗文。李大钊以滦河为喻，自称为“新生活的创造者”。以往我们在研究中，往往忽略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背景和创作环境，今天看来，的确是一大缺失。

与《新青年》一样，《每周评论》也是当时一份进步的政治刊物，只是它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人物”之手，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

^①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

理、反对强权”。该刊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月30日被北京政府封禁，前后共出37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始自第28期，终至第37期。涉及的文章包括：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第28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31号）、《三论问题与主义》（第36号）、《四论问题与主义》（第37号），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第35号），知非（蓝公武，早年留学日本、德国，曾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957年逝世）的《问题与主义》（第33号）。

李大钊当时在五峰山上所写的正是《再论问题与主义》。因此，必须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而使两文所相通的关节点正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关系。

在讨论中，胡适所责难的主要是“主义与实际”的脱节。他在文章中首先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在他眼中，当时“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做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①他专门以社会主义为例说明“主义”的弱点在于使“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而“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

^①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

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因此，要谨防有人用“抽象名词来骗人”。^①

胡适非常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意思，所以特别说明：请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② 他特别告诫人们，绝不能“避难就易”。要懂得，“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③

对此，李大钊坦然承认，“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笔者注）后发生的觉悟”。^④

从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

①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胡适在这里是有所指向的，特指皖系军阀王揖唐，其时任众议院院长，也在奢谈“社会主义”。抗战时期，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8年9月被处以极刑。

②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③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④ 《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同时，李大钊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②

当然，李大钊也耐心纠正了胡适的某些偏颇，他坚信主义和问题是不可分的，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主义的引导。“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至于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也没有绝对化。他并不否认，在问题的“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③

笔者观察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也明确谈到理论与现实（实在环境）的关系，甚至对马克思有所批评。“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要知道，正是有了特定的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

① 《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② 《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③ 《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4-55页。

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①

应当指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着力分析的概念同样是耐人寻味的。李大钊没有提到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是他的疏忽，还是他缺乏有关的书籍参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其实，这正好说明李大钊在选择、在分辨。最后，他尝试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最富思辨价值和实在意义的《资本论》、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上。

论述至此，笔者还想引证一个理论研究的具体历史范例，对李大钊所开创的学理研究之路，做进一步的论证。在李大钊的影响之下，青年侯外庐迈出了他整个人生的重要一步，从德文原版翻译《资本论》。^②李大钊全力支持他努力去做理论的研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老”^③之一，侯外庐的开创之功中凝聚着李大钊的鞭策与教诲，让他终身受益。

1922年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请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实在“不敢说对于他有什么研究”。“大家现在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是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

①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4页。

② 如前所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虽开始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但进展的效果并不如意。李大钊显然是感觉到的，他特别希望有更多的有志青年能够担当此任。因此，侯外庐的出现颇令他欣慰。

③ “五老”即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

少。不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他表示：假以时日，“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告诉听众，“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须把它“系统的研究一下”。^①

李大钊几次向侯外庐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曾反复说过：“拼上半生的功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②。1924年，当侯外庐听从李大钊的教诲，决意翻译《资本论》，从理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真义时，李大钊给予了明确而坚定的支持。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的侯外庐，经同乡高君宇^③介绍，与李大钊相识，开始对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

为了帮助侯外庐进一步开阔理论视野，补充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李大钊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陈翰笙（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25年，开始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为共产党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将自己的西文书籍借给侯外庐，其中就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英译本。我们从中亦可以了解，李大钊能够直接阅读英文原著。

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对和李大钊的最后一次会面，侯

①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59、63页。

②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③ 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

外庐做了详细的追述。这是最难忘的一面。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北洋政府通缉，已避难于苏联使馆的兵营（具体地点应是中俄庚款委员会办公室）。两人见面的地点约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过来的。他向李大钊表示，“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同时强调，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赞同侯外庐翻译马克思德文原著的打算。正是这次会面，用侯外庐晚年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1927年，他留学法国，开始了长达10年的翻译历程。

应当特别提及的是：在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李大钊的两位同乡，河北乐亭人王思华和李乐光给他以特殊的帮助。前者是他的合作者。1930年由法归国后，经陈翰笙介绍，侯外庐结识了同为留法学生的王思华，两人志同道合、相互信赖，共同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并分别在1932年、1936年正式出版。后者李乐光，时为中共地下党员，与王思华私交甚佳，暗中帮助侯外庐找回了当年不便带回国内，留在德国柏林由成仿吾悉心保存的《资本论》第一卷（20章）译稿。同时，他又承担了译著的出版任务。要知道，李乐光是李大钊的族侄，这份亲缘似乎展示着李大钊及其家族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保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方面的接续传承。

三、关于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西学背景

李大钊是一位颇具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有其丰富的西学背景，但他又特别注意对西学的科学态度，既有包容，又有批判。

李大钊的视野开阔、涉猎广泛。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源自于对